

The Foundation on Value Philosophy of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Yan Hui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form of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is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Globalization, an inevitable logical outcome of capital's worldwide operation, has become a fact that needs no proof but must be properly addressed.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have broken the regional, ethничal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become worldly phenomena. Whether active or passive, any nation or country must reposition itself in this logic of the global operation of capital. Correctly and fairly regarding and treating one'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has become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very member on earth. The juxtaposition and overlap of relationships and interests lead to changes in traditional concepts.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the advanced and the backward, there is no absolute space for relying on one's strength and bullying the weak as there was in the past. Rather, consultation, co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maintain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humanity. Globalization began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and developed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expanded in the 18th century. It basically operated under the strong dominance by a few imperialist countries. Such unequal, asymmetric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a deeply entrenched psychology of superiority and a jungle-law value system on the part of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however, as the lat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first-developed countries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dominant psychology and value system of the earl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challenged" or "threatened" as never before. As a result, the early developed countries carried out rampant anti-globalization and backward-globalization campaigns, and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suffers setbacks. Also as a result, the call for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founded on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has become the common voice of the entire human race. What value philosophy can do is to provide the value logic that can be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ual logic of modernization-modernity-globalization-common destiny. That is to say, it gives a defense for the factual logic in the sense of value philosophy, it makes a criticism of non-value and anti-value facts also in the sense of value philosophy, and it serves to construct a foundation of value philosophy for the shared destiny of humanity. Defense,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constitute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value philosophy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f we say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s the destiny of contemporary humanity, the Confucian ethics and Taoism in Chinese culture will certainly enter the world civilization system. Perhaps Confucian ethics and Taoist philosophy will truly become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becaus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re both virtue ethics and normative ethics..

Keywords: modernization,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total dependence, risk society, world concept

Author: Yan Hui received his bachelor's in philosophy fro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 1984 and received his Ph.D. in philosophy from Nankai University in 1998.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al Studie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is also director and a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His field of research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and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Ethical Foundation of Market Economy*, *Humanistic Dimension of Economic Behavior: An Anthropological Paradigm of Economic Analysis*, *Public Life and Citizen Ethics*, *Value and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Philosophy towards the World of Life*.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哲學基礎

晏輝



[摘要]世界歷史交往形式的形成，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社會基礎。由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所導致的全球化或世界化，已成為無須證明且必須正確應對的事實；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已經打破了地區、民族、國家範圍的邊界，成為了世界性的存在。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必須在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中重新定位自己。正確、公正地看待和對待自己與他者的關係，成為每一個地球球員必須高度重視的事情。關係與利益的並置和重疊，導致傳統觀念的變遷。在強與弱、先進與落後之間，已經沒有了以往倚強凌弱的絕對空間；相反，協商、合作、討論愈來愈成為維持人類共同利益的政治基礎。肇始於14—15世紀、發展於16世紀、擴展於18世紀的全球化過程，基本上是在少數帝國主義國家的強勢支配下運行的。這種非平等、非對稱式的世界化或全球化，導致帝國主義國家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優勢心理和強勢的價值觀體系。然而，隨着近五十年來“後發國家”和地區在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日益接近“先發國家”的整體水平，使得“先發國家”的優勢心理和強勢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或“威脅”，於是，由“先發國家”所推動的一種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行動甚囂塵上；於是，基於人類共同的價值訴求之上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呼聲，就變成了整個人類的共同心聲。價值哲學所能做的事情，是在現代化—現代性—全球化—共同命運這一事實邏輯之上，給出可承認和接受的價值邏輯，即對事實邏輯給出價值哲學意義上的辯護，對無價值、反價值事實給予價值哲學的批判，對人類共同命運給予價值哲學基礎的建構。辯護、批判、建構，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哲學基礎的核心內容。如果說，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乃是當代人類的宿命，那麼，中國文化中的儒家倫理、道家精神也一定會進入世界文明體系之中。或許，儒家倫理和道家哲學會真正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基礎；因為，儒道哲學既是美德倫理學，也是規範倫理學。

[關鍵詞] 現代化 現代性 全球化 全面依賴 風險社會 世界觀念

[作者簡介]晏輝，1984年在內蒙古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98年在南開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學學院教授、倫理學與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政治哲學、倫理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經濟行為的人文向度：經濟分析的人類學範式》《公共生活與公民倫理》《現代性語境下的價值與價值觀》《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學》等。

在日常意識和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全球化、現代性似乎沒有強與弱的鮮明態度——既沒有激烈的拒斥，也沒有激情的擁抱；然而，在學術討論中，卻有着強與弱兩種態度的對立：要麼全身心擁抱，要麼全方位拒斥。而正確的做法則應是，哲學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斷。這也是正確看待和對待“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基礎。

一 是拒斥還是擁抱：揮之不去的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判斷或命題，是基於全球化或世界化這一事實之上的。如果沒有世界範圍內的交往與合作，便沒有人類共同命運這一課題；如果沒有各種風險導致世界範圍內的交往與合作失效，“人類命運共同體”便不會成為世界性難題。課題是事實判斷，難題是價值判斷。由於課題與難題是基於現代化乃至全球化這一事實之上的，因此，祇有從現代化的運行邏輯中，纔能理解和把握這一課題與難題。

現代化如何導致全球化、世界化，是需要首先加以確證的事實。“現代”與“現代性”，“後現代”與“後現代性”不單純是一個概念。“現代”“後現代”是與“古代”“近代”相關聯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一個不同於古代和近代社會的新型社會形態。而在西方，“現代”與“近代”通常被當成一個概念，用來特指與歐洲中世紀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類型，而“後現代”與“現代”似乎有明顯的界限（儘管哈貝馬斯把“後現代”看成是“現代”的延續形式），因此，“現代”“後現代”更具有時間性特徵。當然，把不同社會歷史形態區別開來的不祇是時間上的前後順序，更在於社會性狀上的差異。如果不是把“現代”僅僅看作是一個與古代和中世紀區別開來的時間概念，而是視為一個內涵極為豐富的範疇，那就應當從內部挖掘“現代”概念的深刻含義和重要意義。從一般結構角度看上去，“現代”至少包括三方面意義：現代之所以可能的根據；基於這種根據的展開和延續所造成的後果；基於這種根據之前和之後的觀念。與這三個方面對應的概念便是“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它們構成一個完整的圖像：從原始發生看，現代化具有優先性，沒有一個始自近代的現代化運動，現代性和現代主義就無從發生；現代性、現代主義本質上是作為現代化的過程和結果出現的；而現代性、現代主義一經發生，便又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力量推動着（有時制約着）現代化的展開方式和延續形式。時下關於現代性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於作為現代化性狀的現代性、作為現代化觀念形態的現代主義討論上，而對造成現代性、現代主義根據的現代化的研究明顯不足。這是目前“現代性”研究的一個誤區：沒有對市場的、科學技術的、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關於現代性的絕大部分說明都是不徹底的；而一個不徹底的說明，必然會引發概念的爭論和缺乏主題的討論。這也是目前哲學研究的一個致命弱點：對歷史學、文化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相關成果缺少關注，剩下來的就祇有概念爭論和無主題討論了。因此，關於現代性的研究，應當採取生成論的奠基方式，即以現代性是以何可能、如何可能、怎樣可能的追問方式去釐定現代性問題。

當這種社會性狀上的差異，與“古代”“近代/現代”“後現代”概念糾合在一起時，便產生了“古代性”“現代性/近代性”“後現代性”概念。與現代、後現代具有時間性相比，“現代性”“後現代性”概念更具有社會內容特徵。這種特徵是通過社會生產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精神結構等表現出來的。在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韋伯（M. Weber, 1864—1920）等人看來，“現代性與傳統社會相對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斷變動的特點。從笛卡兒起，貫穿着整個啟蒙運動及其後繼者，所有關於現代性的理論話語都推崇理性，視為真理之所在和系統性知識之基礎。人們深信，理性有能力發現適當的理論與實踐規範，依據這些規範，思想體系和行動體系就會建立，社會就會得以重建”^①。這樣一來，現代

^① [美]斯蒂文·貝斯特、道格拉斯·凱爾納：《後現代理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第2—3頁。

與現代性、後現代與後現代性便有了某種通譯性。在當代西方有關後現代與後現代性的論述中，這些概念經常是混同使用的。

與“現代”“現代性”“後現代”“後現代性”這些概念相對應的，是“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概念。“現代主義”這一概念在當代學術論著中並無市場，甚至可以說人們很少使用這一概念，原因在於，人們更關注當下的生活世界，而對近代/現代化運動中形成了怎樣的社會結構和思想理論體系少有興趣；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現代主義所指稱的社會特徵和思想體系均已成了意義不再增加的歷史文本。相反，在當代生活領域，如繪畫、音樂、建築、文學、歷史、哲學等領域，“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是最時髦的概念：“後現代話語甚至已經滲透到了大眾文化當中，湧現出了許多討論各種不同主題的文章，這些主題包括：後現代總統制、後現代愛情、後現代管理、後現代神學、後現代心靈、後現代電視節目等等。”^①

“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現代”“現代性”、“後現代”“後現代性”不同，它們主要是一種思想體系、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更具有主體性和主觀性；而“現代”“現代性”、“後現代”“後現代性”是對社會時間結構和社會性狀的反映和描述，更具有客體性和客觀性。依照傳統理論，當被描述的對象具有確定性、客觀性的時候，祇要用以描述對象的工具和符號正確而有效，那麼這種描述本身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這對自然科學來說有效，未必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有效。因為，一方面，被描述的對象具有多面性，描述者可根據自己的需要着重其中的幾點或一點；另一方面，描述者總是把自己的需要或價值態度附加到描述對象上，從而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描述結果。同樣，後現代主義作為對西方當下社會生活的描述，由於描述者的理論旨趣和生活態度是不同的，而當下生活又是複雜多樣的，所以，並沒有統一的後現代主義；儘管都冠以“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文化”或“後現代理論”的名稱，但其內容和指向卻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有人對現代性持批判態度，有人則持肯定態度。其重要意義祇在於，把現代性作為嵌入現代社會的重要工具來呈現現代社會的內在邏輯。在此中立意義之下，現代性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概念諸如現代、後現代、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界定或劃界就不那麼重要了。

（一）現代化的三根支柱

欲望的神聖激發，構成了現代化的動力；市場的發現與運用，構成了現代化的環境；科學技術的持續創新與廣泛運用，構成了現代化的手段。當動力、環境、手段這三根支柱被並置在一起，並通過相互嵌入變成一個有機整體的時候，現代化運動就被發動起來了。而現代化運動一經運作，便沿着屬於其自身的邏輯貫徹下去。那麼，動力、環境、手段又是如何生成並且相互嵌入的呢？

每個人需求的多樣性與其能力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是人的宿命，終其一生都在努力解決這對矛盾，操勞一生為的是滿足各種需要，以求快樂和幸福。然而，人的需求的不足、匱乏或者過量、飽和狀態，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從外到內的佔有、從內到外的表達，祇是一種可能、一種傾向，嚮往但不必得。人類自從誕生至今，其生理結構並沒有根本的變化，但他們的國家治理、社會管理、社會結構以及佔有與表達的廣度、強度卻有着很大的不同。事實證明，人類構造了怎樣的社會結構和運行方式，也就構造了怎樣的需求結構、欲望類型，以及滿足人的需求、欲望的途徑與方式。馬克思在梳理了人類進行生產、交往、生活的三種類型即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之後指出：“由此可見，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繫。”^②個人的需要結構、欲望強度是與

① [美]斯蒂文·貝斯特、道格拉斯·凱爾納：《後現代理論》，第36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卷，第523—524頁。

他們的自然條件、生產方式關聯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着的”^①。人們對自然的依賴關係越強，自然對人的制約作用就越大，自然構成了人們進行物質生產、物質生活的範圍，也構成了人的需要與欲望的邊界。“這裏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現在：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係決定着他們之間的狹隘關係，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係又決定着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關係，這正是因為自然界幾乎還沒有被歷史的進程所改變。”^②當人們找到了打破自然的限制、人性的限度的生產方式、交換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時候，對需要和欲望的解放作用就充分顯現出來了。發軔於15世紀、發展於16世紀、成熟於18—19世紀的市場經濟，為解放作用的形成奠定了經濟基礎。

（二）市場的發現與市場經濟的建制：全球化的經濟基礎

進入15世紀，人類孜孜以求的一種能夠快速積累財富的經濟組織方式被找到了，這就是市場的發現與市場經濟的建制。而市場的發現和市場經濟的建制，又得益於生產力與經濟基礎的矛盾運行規律以及社會分工的發展。人類起初是自然分工，即男女分工，繼而是社會分工；而在社會分工的範圍內，最有影響力的則是商業與農業、工業的分離，而商業恰恰是與市場經濟契合在一起的。日益精細化的社會分工產生了兩個效果，一個是生產力問題，一個是交往形式問題。“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商業勞動同工業勞動的分離。同時，由於這些不同部門內部的分工，共同從事某種勞動的個人之間又形成不同的分工。”^③日益發達起來的社會分工與先前的交往形式（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解構原有的生產關係。社會運動就是以不斷發展着的社會分工為基礎，以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關係為軸心而展開的。社會分工的另一重要作用就是打破了地域限制，造成了世界性的交往。“單個人隨着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同時，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至於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係的豐富性……只有這樣，單個人纔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繫，纔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④對於由市場經濟所推動的世界化、全球化的人類學意義，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進一步表述道：“一切產品和活動轉化為交換價值，既要以生產中人的（歷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賴關係的解體為前提，又要以生產者相互間的全面依賴為前提。每個人的生產，依賴於其他一切人的生產；同樣，他的產品轉化為他本人的生活資料，也要依賴於其他一切人的消費。價格古已有之，交換也一樣；但是，價格越來越由生產費用決定，交換滲入一切生產關係，這些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自由競爭的社會裏，纔得到充分發展，並且發展得越來越充分。”^⑤與人對人的依賴不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纔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以交換價值和貨幣為媒介的交換，誠然以生產者相互間的全面依賴為前提，但同時又以生產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離和社會分工的為前提，而這種社會分工的統一和互相補充，彷彿是一種自然關係，存在於個人之外並且不以個人為轉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給相互產生的壓力，使毫不相干的個人發生聯繫”^⑥。

資本是沒有文化符號的商品和貨幣，但又不單單是商品和貨幣，而是在它們之間不斷變換

^{①②③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534、520、541—542頁。

^{⑤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6卷（上），第102、104頁。

的“舞者”。這個舞者，就像是引領商品和貨幣不斷變換其自身的靈魂，它使資本的擁有者始終處在極度的欲求之中。說到底，資本的使命就是給資本擁有者帶來增值。於是，正是由於資本的如下四大功能，使得它可以在世界範圍內運行開來，這便是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1）資本是世界性的生產體系得以生成。資本打破了地域的阻隔和文化的藩籬，它把各個國家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整合起來，為着某個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得以創造出來，創造了世界範圍內的生產線。世界性的生產基地的形成，為人們跨地域、跨文化式地滿足各種需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生活實踐的意義上，人們的選擇空間被拓展了，選擇的可能性增強了，於是取得了“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外貌。（2）全球性的生產體系，為人們各種欲望的神聖激發及滿足提供了物質基礎。文化的差異、自然環境的區別、生產工藝的分別，為創造多樣化的生活資料提供了前提，於是，以物的形式出現的商品越來越具有了宗教、信仰、心靈等方面的意義。不但商品是流動的，滿足各種需要的方式也是流動的。基於物質享用之上的情感與精神上的跨地域享用逐漸被培養起來。（3）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非但沒有改變資本的宿命，反倒加強了這種宿命。基於全球性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之現代社會運行邏輯之上的獲取“增值”，成為資本擁有者的更大願望。（4）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因各種原因形成的民族仇恨、政治對峙和文化隔閡，為相互尊重、相互借鑒各自的文化體系從而形成文化多樣性奠定了基礎。

然而，隨着全球化和世界化而來的現代性，從來就不是一個單一的創價過程，相反，各種形態的代價始終揮之不去，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現代性是悖論性的存在，集創價與代價於一身。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有全身心擁抱和全方位拒斥的情感體驗的真實原因。

二 充滿差別、矛盾、衝突的現代性

如同每個個體之間存在差異一樣，各個民族/國家在發展速度、強度、廣度上也存在差異。縱觀全球化、世界化的演變史，在最初所發動的地區化乃至世界化的運動中，貿易、宗教、軍事的運動乃是最主要的形式。在道義、正義的雙重價值判斷意義上，這些形式具有鮮明的反人道性（栗本慎一郎在《經濟人類學》一書中描述的“默契交易”除外）。而就以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發生的全球化或世界化而言，其間也充滿着鮮明的不合理性。

（一）在辯護與批判之間：馬克思的立場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所謂原始積累”中，揭露了“原始積累的秘密”：“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① “所謂原始積累”是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②。馬克思在《德意志形態》中，還表達了對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所導致的全球化或世界化後果的擔憂：勞動者自己的活動結果、自己的產品反身制約着勞動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於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勢，他們一點也不瞭解；因而他們不能再駕馭這種力量，相反地，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着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於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着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③而世界歷史的交往形式的形成，正是這種發展階段的某個特定段落。在這個段落中，由分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所導致的世界化乃是一個悖論性的歷史運動：“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着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

①② [德]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1卷，第520、522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538頁。

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祇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祇有隨着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纔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着‘沒有財產的’群衆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①

在馬克思看來，由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所導致的世界歷史交往形式的形成，乃是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一個世界性後果，這為每一個人成為世界性的存在、普遍性的存在創造了“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也為形成世界性的、普遍的共產主義創造了“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然而，一個必須承認的經驗事實是，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全球化、世界性的生產體系、使用價值體系並沒有回歸到生產者那裏，相反卻成爲了自己無法駕馭的異己力量，根本原因在於，在世界歷史交往形式形成的過程中，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共同體或自由聯合體，儘管爲形成真正的共同體創設了實際前提。沒有這個實際前提，世界性的共產主義就不可能形成。“不這樣，

（1）共產主義就祇能作爲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爲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着迷信氣氛的‘狀態’；（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②共產主義祇有變成各個民族同時發生的行動，一種世界性的共產主義運動纔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繫的世界交往爲前提的”^③。那麼，如何消解生產力不發展便處於落後、腐朽、迷信的原始狀態，而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又會產生不能駕馭的異己力量這個悖論呢？馬克思給出了一條政治解放的道路，這就是建立自由聯合體，由整個社會來安排生產並合理分配社會財富，而這一過程被馬克思稱之爲共產主義運動。“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而轉化爲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祇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祇有在共同體中，個人纔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祇有在共同體中纔能有個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④

馬克思給出的重新駕馭自己產生的力量的政治道路，其出發點是經濟的，但終極目的卻是政治的或哲學人類學的，也就是讓每個人在共同體中回歸自己，讓自己的產品回歸自己。“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了一切舊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基礎，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爲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⑤“隨着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佔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⑥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中均表達了他的對資本主義辯護與批判的立場，一以貫之地給出了政治解決使“人”回歸自己的道路。

（二）全球化當代形態的矛盾與衝突：價值哲學的視野

時至21世紀，不僅馬克思明確表達的全球化、世界化變成了現實，他所表述的全面依賴關係、多方面需求、世界性生產體系也都變成了現實。當然，也出現了馬克思預見但未遇見的差別、矛盾與衝突。價值哲學若要做到對全球化當代形態的矛盾與衝突的分析與論證具有歷史感和現實感，就必須充分運用時空坐標致思方式，這就是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

1. 歷時性結構中的不合理性。全球化、世界化、現代性、現代化運動屬於同等程度的範

^{①②③④⑤⑥}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538、538—539、570—571、574、581—582頁。

疇，它們共同闡釋着15世紀開始的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雖然在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纔開始的。”^①依照布羅代爾(F. Braudel, 1902—1985)在《資本主義動力》一書中的描述，資本主義生產的奇迹之一就是造成了世界“經濟中心”，起初是在荷蘭、意大利，18世紀轉移到了英國，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是在北美。三十多年前，布羅代爾大膽預測，21世紀的“經濟中心”可能“落戶”到中國。大體說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社會設置、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迄今已有近五百年的歷程。現代化運動作為一條水流湍急的河流，先發國家佔據了河流的上游，它們憑藉其預先發展這種優勢，在“輸出”與“攫取”兩個維度上持續地造成歷時性結構意義上的不公平。

在輸出的意義上，從無形、有形兩個層面持續地造成對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不公平。首先，通過資本和技術的輸出，在有形的狀態上控制着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配置，支配着供求關係。另外一種有形的輸出是代價的輸出，當用資本與技術支配了其他空間領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時，水電的耗費，生產與消費中的環境污染，都自然而然地留在了其他空間裏。同時，還以等價交換的名義，把本國的廢棄物品轉移到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而這些廢棄物品所能產生的污染是無法控制和估量的。其次，在無形的意義上，先發國家把它們的價值觀體系、意識形態移植到別一種民族與國家中，通過文化殖民完成文化滲透，藉以從精神和意志上支配其他民族；通過政治制度與體制的移植，從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上控制其他國家的社會運行模式。

在攫取的意義上，通過形式上的平等與不平等遊戲規則，實質性地攫取其他國家的稀缺性資源，如石油、礦產、煤炭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則通過出賣稀缺性資源換取先發國家的資本與科技。如此一來，不發達和欠發達國家就被牢牢地捆綁在先發國家的全球治理邏輯之中，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出於無奈，世界市場這輛戰車都會在全球化過程中將弱勢國家和邊緣國家拖到這輛戰車上來，使它們處在兩難境地：不參與全球化，就會持續地落後、貧窮，無法享用到馬克思說過的其他民族的發展成果；而要參與全球化，就會被先發國家的強大軍事、經濟、科技、觀念體系所掣肘。

2. 共時性結構之中的不合理性。歷時性形態中的問題，以壓縮的形式集中表現在共時性的形態之中。以西方先發國家肇始且基本上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在經歷了幾百年之後形成的世界秩序，依舊是由西方主要國家主導的非公平世界格局。無論是技術總量還是技術含量，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生產能力，西方主要國家無疑是最主要的生產國和出口國。布羅代爾的“經濟世界”理論並未按照他的預期真正轉移到亞洲乃至中國。“西方中心論”不僅僅是一種主張，也是一種事實。如果看不到或不承認這一點，就不能真正認清發達國家與後發乃至落後國家之間的差別、矛盾與衝突。西方主要國家已經習慣了用它們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的力量去控制由它們引領的世界秩序，這是一種典型的以全球化道路、以平等合作名義進行的不公平的“世界歷史交往形式”。馬克思筆下的雇傭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與衝突，演變成了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間的矛盾與衝突。在解決這些矛盾衝突的道路與方式上，“後冷戰”思維矯正了“冷戰”思維支配下的“天幕計劃”，即弱化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衝突的政治思維；進一步地，經濟的、科技的、人文的交往與交流深化了真正的“世界歷史交往”。在經過了四十年的“哲學思維與實踐智慧”的雙重變奏後，中國成為了經濟大國，“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話語”等詞彙開始閃現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由此表現為物質與精神兩種力量衝擊着西方主要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導致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不斷出現在西方學術和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當別一種物質力量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經體系構成“異質”性要素的時候，必然要改變原有的世

① [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23頁。